

97 年度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子計畫三 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

【海外專題研究】

【全球化下的文化創意產業—建築設計的跨界與實踐】

期末成果報告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辦公室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黃永松教授

執行日期：97/7—97/12

中華民國 98 年 1 月 19 日

目 次

- 一、計畫名稱
- 二、計畫目標
- 三、執行情形
- 四、經費運用情形
- 五、執行成果分析
- 六、結論與建議
- 七、附錄

一、 計畫名稱

全球化下的文化創意產業—建築設計的跨界與實踐

二、 計畫目標

建築設計做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領域之一，其主要的策略與發展方向與電影，文學，藝術等大有不同，必須具備更大規模的資本投入，配合城市實質空間的提供才能讓紙上設計變成真實建築；抑或是與跨領域的合作，發展建築旅遊，文化導覽，建築講座和出版展演，也有在虛擬的流動空間展現電子遊戲地景和虛擬城市。本研究則聚焦於建築設計中的形式與文化的形成，特別是全球化年代出現在跨越地域中執業的全球建築師們，在不同的地方實踐過程中，如何思考在地的文化、歷史元素與本身的設計目標之間的關係？而地方建築師如何自處？如何在自身的設計過程中，回應全球文化與在地紋理？如何思考不同美學觀點的結合或轉化在具體的建築設計經驗之中？如何透過組織和制度來處理矛盾和創新的需求？因此本研究選擇中國大陸北京市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觀察改革開放之後各國知名建築師在此與當地本土建築師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本計畫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博士候選人張維修的博士論文其中一部分，主要目標是累積當代全球化下建築設計領域發展之經驗研究。

三、 執行情形

本計劃執行期間從九十七年八月至十二月，分兩梯次前往北京市進行田野資料調查收集與訪談。第一次是八月十日至二十六日，期間前往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及建築系圖書館收集相關資料，查閱文獻。清華大學建築系之歷史悠久，承襲著名建築師梁思成，林徽因的人文思想，為中國建築學領域之重要學府；此行也實際參訪位於北京城市中軸線北端的奧林匹克中心區，有國際知名的國家體育場（鳥巢）和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奧運建築群；以及鄰近中央美術學院的七九八文化創意藝術中心與北京遠郊區的宋莊藝術村。同時，也透過中國規劃設計研究院的安排介紹，與北京市主要的建築設計院和建築設計諮詢公司，建築師事務所接洽拜會。

在第二次到訪北京之前，我們在台灣先整理部份資料和檔案，開始規劃可能的訪談名單與訪談內容，並一一聯繫受訪者。十二月六日至二十三日，

第二次前往北京，參觀備受爭議的 CCTV 大樓和中國大劇院，同時，最主要的任務是訪談建築領域的學者專家。訪談學者專家名單如下：

姓名	職稱
劉洵藩	前中國建築設計院院長
朱濤	建築師、建築評論家、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史建	建築評論家
李興鋼	國家體育場(鳥巢)中方建築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築師
崔愷	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
王軍	新華社記者，<城記>，<採訪本上的城市>作者

五、 執行成果分析

(一) 文化創意產業之論述脈絡

本研究整理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文獻的三個主要觀點：

1. 馬克斯主義觀點：

- 文化生產作為一種有量產規模的經濟活動，藝術也是一種文化勞動（cultural labor），而消費文化產品的人，為特定的社會階層（cultural class）。
- 新文化勞動與消費階級的形成，產生新的社會意義。

2. 人文主義觀點：

- 文本的生產，藝術/創作（art and activities of creation）以及藝術家/工作者（the artists）的定義和爭議。

3. 自由主義觀點：

- 瞭解符號性創意(取代藝術的用語)的生產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如何進行再生產，流通與消費等多方面的經營和管理。

在這三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之上，架構著三種不同的研究取向：

1. 文化（商品）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 approach）

討論經濟學中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模型如何被運用到文化產業的分析。這種取徑特別重視的議題包括：私人企業的經濟活動如何有效率地生產，如何維持自由競爭和自由市場機制（free market mechanism），以達到市場中的供需平衡（the balance in market）。對國家政策的看法，基本上把國家當成維護市場機制的的外在因素，所以主張管制越少越好。

2. 文化與傳播的研究：自由多元主義取徑（liberal multicultural approach）

這種取徑主要是藉用政治學中的自由主義民主發展模型來探討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對於公共生活的影響，甚至，如何通過影響社會中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的形成，而影響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ss）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的內容。所以，這類的取徑，著重討論公眾文化的形成，以及傳播科技介入對於公共性（public sphere, public-ness）的影響。

3. （批判性）政治經濟學（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pproach）

批判政治經濟學乃主要受到馬克斯主義的影響，探討文化產業中產製過程中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文化消費階級之生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class）。相較於傳統文化商品經濟學，較重視政治倫理以及政治規範性的議題。特別重視國家（the state）如何以政策或制度來介入文化經濟活動，以及形成如何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 或者，一般稱為霸權）。

（二）文化創意產業在中國

中國大陸官方正式使用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是在 2005 年年底，由北京市市委書記劉淇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九屆第十一次全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著力抓好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隨後，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在北京市第十二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指出文化創意產業是北京未來的工作重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進入北京市十一五規劃方案。2006 年 3 月，北京市政府成立文化創意產業領導小組，隨後決定自 2006 年起，每年編列五億元專項資金用於扶持服和重點支持方向的產品，服務和項目，並設立五億元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基礎設施專項資金。

在北京市發展及改革委員會頒布的《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指導目錄》中，文化創意產業的類別共分為十一類，我們所熟悉的建築設計與城市規劃，名為設計策劃，包括工程勘察設計與規劃管理。工程勘察設計，指建築施工前的工程測量、工程地質勘查和工程設計等活動。規劃管理，指對區域和城市、集鎮、村莊的規劃，以及其他規劃活動。

在這項文件中可以見到北京市政府的政策，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規範僅限於產業的資本來源以及相關事業主管部門。例如建築設計業允許社會資本投入，包括外國投資(含香港澳門和台灣)。主要管理機關為建設部和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在行政許可方面僅審查是否具備工程勘查或設計單位的技術執照。因此，對於一般建築師事務所的申請設立可以依附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之下對外開放。

然而，事實上早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開始之前，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已經有許多外資企業和西方國家的外國建築師進入中國開始執業。以北京市為例，從最早的旅館和飯店與室內設計，逐漸擴展到辦公大樓和商業大樓和住宅，醫院等類別。第一棟外國建築師設計的作品是貝聿銘的香山飯店(1982)以低層庭院式的方式在北京郊區建成，這也是中國與美國建交之後，第一個美籍華人建築師在中國大陸的作品。隨後的長城飯店(1983)國際貿易中心(1989)以玻璃帷幕的現代材料，強調科技與技術的投入，陸續地出現在北京市。

這些建築採取不同的建築形式語彙和設計手法，仿古與現代併置，突破了傳統北京城市的天際線，也促成了當地建築領域的制度面改革。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使得建築設計領域的部門為國家機構，隸屬於建設部等相關部會。改革開放後陸續從部會中獨立出來成立了華森建築與工程設計顧問公司(1980)、中京建築事務所、大地建築事務所(1985)等等。一方面市既有體制的轉型，另一方面也吸納了逐漸增加的海外歸國的留學生。

(三) 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案例分析

2001年7月，北京市申奧成功。當時北京市政府承諾2008年的奧運會，包括城市基礎設施的總投資將超過2800億元。尤其是2002年加入WTO之後，對於建築設計領域的開放承諾，早於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支持，當時即允許外國企業在中國成立合資，合作企業，並承諾加入五年後，允許外商成立獨資企業。因此，WTO的架構提供了外國建築師事務所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也促成中國本地建築師的挑戰。

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數字看到外國建築師與本地建築師之間的競爭激烈關係。1998年，北京國家大劇院競圖競賽，全世界共有44個方案提出，其中有具有外國背景的佔了21個，比例尚未超過50%。2002年的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規劃競賽，共有55個方案提出，有外國背景的33家，超過50%。奧運場館建築，國家體育場(鳥巢)有13個方案提出，11個具有外國背景。國家游泳館(水立方)有10個方案提出，8個具有外國背景，比例已經上升到80%以上。而且，這三個標誌性建築最後採行的設計方案都是外國建築師或中外聯合設計出線。

以國家體育場(鳥巢)的設計過程為例，2002年4月，北京市計委成立了“奧運項目辦公室”，專職負責奧運場館和相關設施建設專案法人招投標的組織、協調，並制訂各類招標相關檔案文件，積極向國內外推介奧運場館的建設計劃。6個月後，北京奧組委向全球公開發售奧運專案資格預審和意向徵集文件，每套售價6600元人民幣。最後通過資格審查者，共有來自中、美、法、意、德、日、澳大利亞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7家獨立參賽單位和7家中外建築聯合體參賽單位參加概念設計方案大賽。

2003年4月，經過嚴格的評審程序和群眾投票，由瑞士Herzog & de Meuron建築師事務所、英國Ove Arup工程顧問公司及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設計聯合體共同設計的“鳥巢”方案，以新穎的設計，獨特的結構，成為國家體育場的設計方案，“鳥巢”的暱稱也迅速地在全球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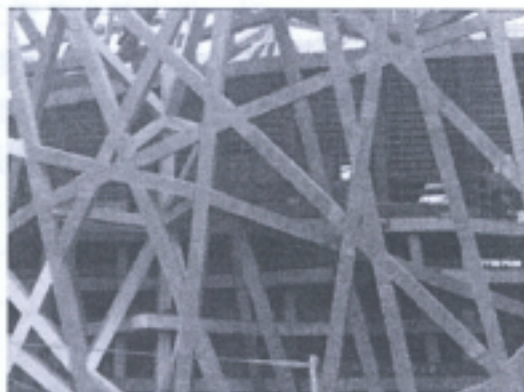
在設計過程中主要參與的角色有Herzog & de Meuron建築事務所(瑞士)的赫佐格(Jacques Herzog)和德慕隆(Pierre de Meuron)與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築師李興綱建築師、藝術顧問艾未未和前瑞士駐北京大使席格理(Uli Sigg)。瑞士籍的建築師兩人皆出生於1950年，相同的學經歷，在瑞士的巴塞爾(Basel)上同一所小學，畢業自瑞士聯邦理工學院建築學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並在1978年創立Herzog and de Meuron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兩人長期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並於2001年同時榮獲普立茲克建築獎，創下了普立茲克建築獎同時頒獎給兩位建築師的首例。

李興綱是中國建設部直屬的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建築師，畢業於天津大學建築系，有法國留學經驗，曾榮獲英國世界建築提名獎、亞洲建築推動獎、中國建築藝術獎等多項國際國內獎項。2003年1月，出任鳥巢的中方總設計師。席格理是個瑞士藝術收藏家，前任瑞士駐北京大



使。他本身十分熱愛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和跨國仲介的身分，為許多中國籍的現代藝術家在歐洲打開了知名度和市場。艾未未，是艾青之子，學電影但是和大多數的前衛藝術家一樣，有許多跨領域的實踐作品，是世界各大前衛藝術展的常客。

鳥巢的設計過程有別於過去一般外國建築師繪圖設計再交由中國建築師進行施工圖繪製的分工模式，而是採取另一種新的嘗試，讓雙方的溝通與互動更為平等。早在競圖階段，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的建築師李興鋼便派駐瑞士，與赫佐格和德慕隆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合作。施工設計階段時，瑞式建築師們則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建築師們一起工作。雙方必須適應各自的文化背景與思維邏輯，同時還要克服不同的工作模式。



而鳥巢的形式是怎樣產生的呢？李興鋼建築師提到“我們很多的時間都在討論體育場‘外罩’的結構，最後我們找到了這樣一種編織式的結構，它有點像自行車輻條的編織情況，48根大梁沿著中間的開口相切，然後一下下向後編織起來。”“這樣鳥巢的設計基本就完成了，一步步按照它的功能邏輯、結構邏輯、美學邏輯，達到一個由內到外的設計結構。並不是開始先看到一個鳥巢，然後決定做一個鳥巢的。”他說，鳥巢的功能與結構確立之後，形式的設計是以中國傳統的碗鉢作為設計原型，以「外觀即結構，結構即形體」的概念，將巨大跨距的網狀鋼構，交織成不規則的網，追求建築形式與結構功能的合一。2008年3月，英國《泰晤士報》報道倫敦設計博物館宣佈了在過去的12個月中最具創意、最具進步性的國際建築設計，是北京奧運會主場館“鳥巢”。主辦單位的評論是「該建築設計新穎獨特，它是自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以來最具創意的現代體育場，它象徵著正在崛起的中國。」建築師德慕隆說：「‘鳥巢’就像是一個用樹枝般的鋼網，把一個偌大的體育場編織成一個溫馨鳥巢，寄託著人類對未來的美好希望。它看似隨意、雜亂無章，但其實卻傳遞著清晰的建築理念。」



尤其是針對形式的爭辯，反而是建築師掌握了「地方文化」的論述，建築師赫佐格說：「人們形容它是鳥巢，這可能是公眾印象，但實際上，我們還可以把它解釋成其他中國建築上的東西，比如菱花隔斷，有著冰花紋的中國瓷器。它是一個容器，包容著巨大的人群，這就是中國。」中國



傳統的花窗和冰裂釉被建築師的論述轉化成為設計符號，完成了現代建築中對於形式與結構的高度整合，顯示出對於中國文化的連結，表達出建築與所在之東方美學的關係，而使得最終的形式產生巨大無比的震攝力量。

有別於位於天安門旁北京國家大劇院¹的設計所引起的巨大爭論²，相隔十年出現的鳥巢和水立方及其他場館建築形式與文化的討論並不多。以鳥巢為例³，曾經有四名院士上書溫家寶總理，以經濟、安全、實用、美觀的原則，指出部分奧運工程「崇洋奢華」，「片面營造視覺衝擊」，以至於極大提高了工程造價，並忽略了安全、實用、環保等建築基本要義。消息出現之後，媒體大幅的報導；而且當時法國戴高樂機場發生坍塌事件，也引發了人們對於新式結構系統的憂慮，最後政府作出了「奧運瘦身，節儉辦奧運」的決定。奧運場館的安全性、經濟性問題一時之間成為焦點，鳥巢全面停工重新檢討之後。將預算從四十億刪至三十一億完成，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會場的國家體育場，在一年多時間裡，工程造價估算一變再變，前後相差達25%。

不久，以張寶全、任志強、王明賢等開發商為主要發起人的「青島聲明」，發出反對修改設計的聲音。參與聲明的人也包括史建等建築評論家，他們認為目前鳥巢屋頂的修改方案會讓升溫中的奧運經濟造成影響，有損北京乃至中國在國際上開放進取的形象。他們表示，擁護“節儉辦奧運”的務實精神，反對貪大求洋奢侈浪費；同時贊成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觀，反對「一刀切」的形式主義。不能機械地以單一的造價因素來衡量建築的價值，如果鳥巢以取消活動屋頂、縮減結構框架來降低造價，將會使鳥巢失去其作為經典建築的完整性，由此造成的歷史性遺憾將無法彌補。他們認為，修改後的鳥巢失去了原有設計手法的震撼性和功能的合理性，由於立面框架支撐活動屋頂作用的喪失，使原設計的具有功能性的巨大結構框架成為“虛張聲勢”的、反而徒具表演性的外衣，脫離了功能，不僅破壞了原設計的完整，也有違「節儉辦奧運」的初衷。然而，這樣的呼聲並沒有奏效，最後的設計仍取消了鳥巢頂上的開啟屋頂，作為節省經費的調整。

這些討論僅止於經濟預算和效率或形式與功能之間關係的論述，對於形式本身的思辨幾乎缺席，由其是對於地方環境紋理的適應與條件，更不可能

¹保羅·安德魯（Paul Andreu）1938年7月10日出生於法國波爾多市附近的Caudéran。1961年畢業於法國高等工科學校（*école Polytechnique*）、法國道橋學院（1963年）和巴黎美術學院（1968年）。29歲時以設計巴黎戴高樂機場候機樓而聞名，從此成為巴黎機場公司的首席建築師，在世界各地規劃設計了許多機場。

²支持者如吳煥加認為圓形的形式是獨一無二的原創設計，與周遭的環境容易融通於建築格網之中。也有人認為採取法國建築師的設計，得以在充滿行政色彩的天安門廣場邊接納這個，代表一種進步和包容。反對者如吳良鏞、何祚庥等四十九名兩院院士曾聯名反對過這個大劇院，認為該工程設計，是典型的形式主義。而彭培根認為，水池與建築的關係，將嚴重影響逃生和避難的功能；其形式與天安門廣場周邊那些的標誌性建築並不協調。

³第三件是藝術顧問艾未未，曾經發表意見反對「奧運」而非場館本身。

有挑戰的聲音。也就是說，透過奧運建築的例子來看，西方建築師在中國所主導的空間文化形式的論述能力和廣大的影響力日漸擴大，而且我們看到的最重要和最大規模的計劃，仍是西方全球建築師的優勢所在。

(四) 從「來中國做設計」，到「為中國而設計」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於中外建築師的爭論由來已久，在 1953 年之後的七年時間，蘇聯曾經派遣三千位技術專家到中國，包括建築師結構技師等等完整的團隊。蘇聯設計院現成的模式被直接移植過來，當時興建的建築物的過程，也每個部門全部都有蘇聯專家的參與。最經典的代表建築為北京展覽館，完全是蘇聯的折衷與復古建築思潮的反映，當時提出適用，經濟並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這批專家來到中國做設計，同時也帶來較為全面的建築設計院的組織系統，管理體制與工種配備等長遠的制度建設。

改革開放之後，思想上的禁錮也隨之解放。建築哲學與國際建築發展的進程也慢慢影響到中國。尤其伴隨著建築技術的提升，材料的增加和資訊工具的出現，使得各種可能的實驗也逐漸出現在中國的城市地景之中。日漸擴張的交流也透過知識和人的流動，在全球化的年代，有大批大量的西方建築師長驅直入京城，開始用他們的角度介入中國的快速城市化過程。

對於開放西方建築師到中國執業的成果，北京建築設計院的資深建築師馬國馨認為許多外國建築師往往急功近利，為追求標誌性，形式而不考慮國情，不計成本，不計效益等主導思想，扭曲了在選擇時的判斷。就像病人看病，首先要選準醫生，是西醫還是中醫，其次還要看他擅長某科，醫術是否對症，找錯醫生吃錯藥都治不好病。追求新、奇、特，脫離現實表現了價值觀的混亂，在選擇時唯一考慮的就是造形，讓人眼睛一亮，以為其他功能問題將來都好解決，但諸多實踐證明並非如此。所以近來的評論都提出要回歸適用、經濟、美觀的重要原則，隨著時代的發展還要加上安全和環保、可持續發展等新的價值。這種二元式的觀點，將複雜的文化交融現象引導至中國歷史上長期的爭辯，透過中西醫的比喻，提升到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對立；並且將建築衡量的標準拉回到 50 年代的受到蘇聯影響下的幾項原則。

然而，當建築設計已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時，這些跨越地域在全球流動建築師們，在不同的地方實踐過程中，運用地方符號的能力，思考在地文化的深度在不同的設計目標之間有高下之分，但不可否認的，當全球知名的建築師也能掌握地方紋理和傳統文化符號，並且逐漸掌握論述的優勢，東西方文化或不同的美學觀點的衝擊是否可能會出現超越血統出發的價值判準？

六、 結論與建議

從1947年法蘭克福學派開始提出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的概念之後，文化工業一詞具有對國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強力的批判力量。在報紙、廣播、電影興盛而成為支配性文化形式的年代，強調大眾消費文化的產品，其實是由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和規訓工具的支配管裡的文化，電視普及商業化之後又將成為文化工業最具影響力的媒介。當今中國建築設計的發展現狀，也是透過消費文化和電視媒體的打造之下，呈現出更多東西方文化支配力量的互相參雜滲透的現象，建築形式成為設計師們追求的重點，新奇突出的震撼力量，改變著我們所見的城市中陸續迸發的全球空間形式。

建築的深度必須源自於文化的廣度，文化無形的精采內涵始能表現於建築與設計的有形感動。透過建築得以實踐文化，但是是什麼文化？誰的文化？若以北京市的奧運建築案例為例，讓我們很清楚的看見，建築師們遠離了文化的勞動者的身影，而邁向明星建築師之途；境外建築師的跨界實踐已經從來中國做設計的階段，進而為中國做設計。建築成為文化活動和全球體育事件的領頭羊，地方傳統文化轉化成為新的符號和意義，展現出新的集體主義美學，透過媒體的轉播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建築所產生的文化感動，衝擊著全球化下的新世代；背後的生產過程，也就是文化創意產業形成的過程。此時，難以血統區分外國建築師與本國建築師的在地實踐，所有的文化都互相牽涉，沒有一個是孤立和純正的，當建築師們從這片土地擷取創作靈感，從在地的這群人們延伸創作想像，經過縝密的觀察和細膩地實踐，也得以呈現屬於那塊土地上人、事、物的美學深度與文化氣質。

七、 附錄

赴大陸收集台灣無館藏之資料清冊

1. The Office BOCOG Newsletter
2. 新視線 The Outlook Magazine 中國拼貼專輯、運動最光榮專輯
3. 時代建築 Time+Architecture 輝煌與迷狂：北京新建築
4. 世界建築 World Architecture 境外建築師在中國
5. 世界建築 World Architecture 北京奧林匹克中心區
6. 奧運 2008 特刊
7. 奧運中國特刊
8. 北京 2008 年奧運會國際體育傳播手冊
9. 另有部分為平面報紙與建築師事務所作品集

10. 訪談紀錄摘錄

20081219 北京 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劉前院長

劉院長：我們就是這樣，解放前就是設計室，到解放後就沒了，然後到改革開放以後，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開始民營式的。從1993年到現在，現在更快了。像我們這樣的屬於國有制、公有制的。我們叫民營工作室的，稍微有點名氣就開事務所。還有一個是不掛名的，但是也是他個人牽頭做的工作室，搞建築的14個工作室。這個工作室誰挑頭兒呢，你挑頭兒、拉個幫、十來個人，主要的項目、主要的方案主持是這些人來牽頭，這樣掙點錢。現在也下來一部分，什麼都是我做。但是逐步可以歸到個人名下。現在有這個工作室，這個能維持多久呢，也不太好說，但是從這個走向看，民營經濟跟國外差不多，國外大的事務所可能多一些，但是真正的工作室在這個社會，我掛名就能做一個工作室。掛設計公司裡也很難的。但是在香港也不是，中國這類東西倒很多，當然不是都做，現在我們也在做，但是做得怎麼樣呢，需要看以後。但是民營工作室有了，稍有名氣的，在這個工作室裡有的懂、有的不懂，這個工作室很大，有十幾二十個，但是有名的少。他掛名是掛名，但是我的專案委託給誰了，讓工作室做，但是不見得都能做，不是所有的項目都是我做，但是重要的項目他要親自做，誰做掛誰的名字，不可以把人家的名字全占過來，你是指導就指導，你是主持就主持。

提問：其實我是在……

劉院長：其實跑得挺快的，現在變化太快了。現在都承包了，現在的一百人左右的工作室，專業工作都很全的。但是這幾個小名人來做，但是人家是用人家的大牌子。再一個裡面有很多小名人，這個人不夠，那我要考慮考慮，那項目就放下可能就走了。

提問：但是這種小名人的現象是在什麼時候才慢慢出現？

劉院長：應該說二十一世紀開始，2000年開始。現在都開始，我們叫做體制問題，研究體制和機制，組織的模式、責任制度都變了。在2000年以後，很多設計院就出現了，但是我覺得比較成熟的就是民營工作室，有個人工作室，但是都是比較獨特的，跟工作室還不一樣。我們剛才講工作室，我們建築院有14個工作室，太誇張了。我都不知道裡面是誰，但是有4個民營工作室，全部是建築，還有一個是結構的，鋼結構做得好，他留學日本，是我們的副總工程師，他搞了一個結構工作室，這個我覺得挺好，有一些優勢。底下那些不是，像我們院光建築這塊有將近200個工作室，特別多，當然又不好動，這裡又組合成14個工作室，你做一個維修工作室，誰也不認識，就組成成了大的工作室，那麼如果他牽頭，工作室的主任就是他，人家也有點小名，但是那個概念不強。

提問：對，我覺得個人的概念不是很強。

劉院長：像崔凱工作室就是要有特定要求就是我們做，沒有特定要求我一個崔凱工作室就做了，搞個方案的審批啊、搞個方案的藝術性、搞個方案的客觀價值，他就可能組織人做個指導什麼的，但是主要的設計不一定歸他，因為他有二十多個人。

提問：個人工作室這個概念大概什麼時候被提出的？

劉院長：在2000年以後，可能在2003年期間被提出的，但是工作得挺好的。但是也有問題，比如說名人工作室是名人出名，你打出來大家都捧他，你好多人都跟著他，有才能可能在一個階

段被埋沒。當然不見得崔凱不好，他可能做得方案很棒，但是可能是他指導的，可能設計人也不是，可能是你，但是掛名是他。還有好多人不服氣，說好多項目像大項目、有名的項目都是好多名人去，非名人就是做一些別的項目，錢也有，但是沒有名氣，因為有這種心態，不像美國、英國，賺大錢就行了，沒名氣我認了。

提問：基本上你還是有一個這樣的態度？

劉院長：這個市場意識真到了以後可能這方面就會平穩一些，大家客觀上也能接受，是一種心態。在過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絕對沒飯吃，現在拉個活，也就夠吃了。

提問：在八十年代是什麼樣的？

劉院長：那就是過去所謂集體的那個東西，我畫了那麼多圖怎麼沒我的名聲，怎麼非要借你的出名，我也不錯啊。另外在利益分配上也有麻煩，比如接這個項目十塊錢，我能拿多少呢，拿五塊或者拿兩塊，拿五塊的沒意見，拿兩塊的有了，為什麼他一個人拿五塊呢、我才拿兩塊。也試圖這樣去做，不行。要成立起來才行，比如我要成立一個崔凱法工作室，誰跟你去啊，給你最大的利益不要啊。現在可能好一些，有些人也是，比如大學生剛畢業，進到那裡也沒名沒氣，過去有師傅帶徒弟，你就幹活就行了，跑龍套，有這種心態，也考驗自己的心態。也分事務所，現在有些私人事務所已經改了。陳世明（音）你是知道的，是現在比較有名的，他那天坐在車上聊天，說你這個老闆怎麼做的，對啊，都是羨慕我的工作，都是羨慕我有前途，什麼專案都是我幹，因為他在香港註冊，在國內肯定不行。他自己負責，你管不著，我們現在好多事務所他也負不了責，真如果是傾家蕩產他受不了，現在好多事務所就這樣倒了。

這是在九十年代，我們叫拉杆子、找公司，有些是這樣成立的，現在、過去都有，像我們這種退休的人有的不甘心退休，又拉了一個公司。

提問：那在在最近這十幾年，您覺得與國外的建築企業，因為體制上其實不同的，比如個人在這裡直接開業，這種資質上是有問題的。

劉院長：資質沒問題，加入 WTO 以後，可以申請國民待遇，你有資本、我有資本，只要我承認你的資本，因為現在有差異，比如幹施工圖比較麻煩，其他的都可以，我們可以做初設計，也可以做施工圖，因為現在職業這塊還可以。但是施工圖必須和中國配合，因為有規範的不同，歐洲一般用英尺，我們用米，換算起來很麻煩。所以一般的施工圖要求合作，但是方案都在裡面，所以現在這麼做也沒有問題。現在當然一個問題我覺得是成本，不會是其他的，因為成本差得很大，尤其人工成本，臺灣估計差五倍到十倍，香港跟我們差五倍到十倍。他養不起，因為他來了以後有些人雇的當地的。

提問：也有一些全球知名的這種企業

劉院長：當然，沒有有問題。

提問：他們怎麼去跟當地的合作？

劉院長：他有一個合作，他一般不希望合作，這個合作你說不清道不白，你再有名氣中國也不買你這個賬啊。所以還是要合作。你來給我做方案的時候，你必須有兩個身份，第一身份，你有美國、瑞士當地的資格，還有一個營業執照。資格就是你能幹什麼樣的工程，營業執照就是你有什麼樣的營業經營權。這兩個拿到中國來，是真實的原件，一複印一登記就行了。你可以來註冊一個事務所也可以，他們有好多在大陸都有。因為你那個資格是當地承認，不可能我去承認，那怎麼承認你啊，所以現在基本都是這樣，到九十年代就開始。所以現在最熱的是歐美和日本，

現在臺灣和香港退到第二了。八十年代是香港，九十年代就全都來了，但是到九十年代末期就少了，說得好聽點就是世界著名的建築，中國開始認識他、承認他、也歡迎他，所以現在超高的大項目，基本上都是那些人，那些原來的人。他們也願意找一個中國的、有相應水準的做他們的合作夥伴。這樣一方面是形象好，第二施工起來有很多的細節，能保證方案如實的往下走，保證到最後不變形。他願意這樣做。利益方面是共贏，你拿你的錢、我拿我的錢。在大陸拿錢不少拿。但是話說回來，你也有利我也有利就行，他成本也很高。所以現在名家也看到中國的開放程度，只要得到資訊，因為一般招標都會上網，或者乾脆公開地說買吊車、買資料，然後找一家設計院說我能做，我提供資料，他們做模型、出圖，我們的便宜啊什麼的。

提問：他們怎麼尋找？

劉院長：尋找就是上網，再一個就是跟當地的人有合作。像我們有的長期合作夥伴，一有消息告訴，一看有目標，一商量就去了。就是這樣。他們都是在中國找一個合作夥伴，像鳥巢這個設計師，安德魯什麼的，都是公開的，聯繫以後，他選你你也選他，選完以後大家就一起合作。選完了以後，我們派一個助手，很年輕的，就派他去了，去了以後來就搞理念、搞創意，外國人這方面比較靈活，我們再提供中國傳統的文化，就做出來了，出來就中標了。主要的創意落實在到成型，都是國外公司在做，我們提供的資料、提供的意見，包括中國的情況提供意見，做完以後呈現給他們。國內的也有點輕視國內自己做的，像報名的時候，國家大劇院也是報安德魯的名字，開始要和清華合作，我自己也拿了一個，然後就中標了。中標了以後，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就開始選，選了後來又取消了，後來又起訴，扯不清楚，院長還抱怨我，花了兩千多萬，都讓你給拿了，我說不拿就不拿，但是這個設計，因為我要參加建設，還有一個小劇場，兩千多萬，一個小劇場，人家不好意思，說你再審核吧，都是這樣。這個合作有時候也不太好，我們只派有經驗的，必須找施工最棒的。

這個要自己找，找完了以後，把方案做完了就放心了，施工圖就按照這個走就行了，現在合作設計是進入中國最快的辦法，而且是接觸中國、熟悉中國最快的辦法，也是將來在中國站穩腳跟最快的辦法。單槍匹馬的不行，哪怕你用兩個海歸在你的工作室工作也不行，太難了。

現在這個模式我覺得可以，將來可以甩開了、單獨做了，那就看將來的標準規範了，很全了、都一樣了，甚至標注的尺寸都一樣，人家看無所謂，來就來了，合作不合作無所謂。接受外國也不用太麻煩，要自己試。我們事務所配合倒麻煩了，到了現場，跟到底，最後 5% 的設計費不給你，一直到竣工了、驗收了、都做好了、人住進去兩三年了，最後 5% 基本上就沒了。要到最後，什麼水通不通啊、電通不通啊、這個怎麼受得了，我們有現場的會計制度，就一直跟著現場走。因為外國人收費比較高，中國人做不到，因為他收費低，工作人員住在現場，施工週期三年，住三個人甚至四個人，這個費用太高。因為他一直在中國，他理解以後，這個錢不知道多少，我們要錢一年十萬美金，我們的人不可能這麼多，你給十萬人民幣就可以了。還是合作的。

提問：如果我們回到比較早以前的經濟發展的狀況，在改革開放之前，他運作的模式，我知道那時候曾經有一些蘇聯的專家，也曾經來做合作。他們的合作過程是怎麼樣的？

劉院長：他的合作是派一線專家，他們派專家來，他的專家是很全的。不像這個單獨一個設計。

提問：他是一組？

劉院長：比如說一千個人，他派一百人左右。但是都是按照蘇聯的規範走。中國的建築繪圖，

他給草圖畫完了、施工圖畫完了。

提問：全是按照蘇聯規範？

劉院長：是這樣的，你要講這個歷史，到明年就是建國六十周年了，這幾塊可以比較，每個人不一樣，我這個人是外行、自己個人說話，從1950年開始到六十年代，本土建築不是自己的傳統，就叫做中國的傳統、蘇聯的建築這兩個交叉在一起。蘇聯的是新古典建築，因為他那些東西都是從歐洲到蘇聯、到社會主義革命給演變下來的，莫斯科大學是最典型的，就是那樣的。那套東西原封不動拿來，蘇聯的歷史建築原封不動搬過來，大家也很喜歡。還有一派傳統建築要發揚傳統風格，兩派就爭，最後怎麼辦，這邊全是蘇聯照搬照抄，這邊是維持中國傳統。北京這塊基本的東西是蘇聯的，你看旅館，三裡屯那邊的那個建築，都是那樣的，因為中國的建築符號大概也沒什麼，到了臺灣也沒招，臺灣也是大廡頂，包括故宮、國務院都是大廡頂，世界最大的皇家園林。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就批判了，大廡頂太貴了，很多就諷刺建築師給錢隨便花，給批了一下，說復古、懷舊，抱住歷史不放。到六十年代，以十大建築為代表，就是人民大會堂、博物館、美術館、軍事博物館、北京站、北京飯店、民族文化宮這一批，你可以看出來，基本上是蘇聯和中國傳統的一種結合，開始有自己的東西體現出來，人民大會堂是蘇聯的，跟蘇聯的大會堂很像。

提問：但是那時候不懂？

劉院長：那時候中蘇關係開始不好了，他不走也得自己幹，建國十年了，你得有自己的志氣，表現表現，那個建築是中國風格的，但是你看西方的影子很重，真正傳統的東西，像美術館、民族文化宮，其他的都是中西合璧。六十年代就開始走自己的路了，蘇聯退出去了。在北京可以看到，廣播電視大樓，現在叫廣電局，在復興門，還有一個就是展覽館，那是最典型的。還有一批現在拆光了，所有的工業建築、所有的工業建築的生活區的住宅也都拆光了。現在拆得差不多了，現在房子到期了，現在我們對面百萬莊裡還有一批房子，三層樓，也是蘇式的建築。到了六十年代有自己的東西了，但是後來也停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蘇聯也走了，我們也不學了，走自己的。那時候有一種爭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建築風格，什麼是社會主義建築風格，開展討論。反正民族的、地方的這兩個大概沒有太大爭論，現在民族的、地方的很難了，現代怎麼現代，你這個現代看到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初，你說的傳統的，傳統除了個別建築帶有一些傳統的具像以外，其他的沒有了，都比較現代的建築。最繁榮的就是八十年代了。八十年代這一代，因為改革開放了，總要進來一些新的東西，以香港為代表的，特別有創造力，搞香港式建築。在深圳是最明顯的。他覺得很現代，開放的新東西進來了，但是又想表現一下自己那套，但是是擺脫不了香港的感覺，他也想把自己體現自己，但是在往裡攙。到九十年代，開放範圍擴大，歐美就進來了，歐陸風氣來了，一片黃牆紅瓦，房子、家裡都是歐式風格，開發商拿這個做賣點，歐洲別墅、南歐、北歐、地中海都是這種類型。歐洲吃香了，也分兩派，一派說好。中式建築這時候有點不服氣了，這麼吹也不行啊，自己的東西是什麼不知道，就開始探討。又出現了一批中國自己的東西，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又出現兩點，一種又出現大廡頂，北京一看大廡頂，這是中國的、傳統的，重回古都風貌，這個口號也不錯，有什麼錯的，但是是不是都要去蓋亭子、加琉璃瓦、蓋大廡頂，也不見得。最典型的的就是北京西客站，現在越來越把中國傳統的符號加進去，後來又加到一些特殊、標誌性的、文化性的建築風格，地地道道的風格，像美術館，越現代、越傳統。後來就出現北圖，那個是我們做的，最典型的風格，那個很好看。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什麼是中國的，有

些建築師開始探討，中國風、歐洲風。玩了這麼多東西。九十年代是最繁榮、最亂、最七嘴八舌、最開放的時代。中國建築最不服氣，搞了很多自己的東西，但是是不是很現代，可以去看，基本上是在融合，融合了很多中外設計的東西，也可以說不倫不類，也可以說是融合，這些觀念都有。繁榮是繁榮，但是是城市面貌和建築面貌變成最快的一個，是九十年代。你是年輕，你老了十年不去一個城市，真的不認識，不管是天津、北京、東莞、深圳，到西安、成都，這些你根本不認識。世界最新的建築、流行的建築中國都有。實際上是一種開放的、引進外國的設計理念、建築趨向現代化，主要是傳統加現代化。但是不知道怎麼結合，傳統和歐陸式的弱化，就出現了一些特殊建築，有很明顯的，比如說陝西博物館，純粹的大廡頂，但是很傳統，但是也非常現代，包括技術風格也現代。包括社區也是這樣的，看著是四合院進去以後不一樣，這代我覺得是最繁榮的。

到了這十年，2000年以後，中國徹底開放了，什麼都行，只要喜歡就蓋。世界化了。

提問：這個爭論有沒有小過？

劉院長：沒有少過，但是最近這個爭論引起的不多，有少數的爭論。到了2000年以後，這八年徹底開放，因為採取世界招標，判斷是國際評委，國際評委一般得九個，中國五個，外國四個；或者是十一個，中國六個，外國五個，一公開了，我評了一等獎不要，人家專家評論是第一，你說我不要、我就要第三的方案，不可以的，大劇院就造成這樣，你同意不同意都要建。

提問：是政治上的，有一些人說是中央拍板的。

劉院長：對，中央他也表態了，公開的，你請了世界大師級的評委評了，還能改嗎？改革開放姿態也應該改了，他評了，評了就算過了。還有中央電視臺大樓，這個人反面意識是最多的，弄完了以後想。

提問：但是你覺得對中央來說，也是要靠批的過程表達一個想法？

劉院長：中央的心態也擺平了，幹嗎都是我說了算，幹嗎是領導說了算。但是在學術上，尤其這種學術上要平等，一定要現代，一定要走向世界，你不可以擺樣子，好就好，不好就不行。過去是這樣的，過去招標老闆一來，什麼招標不招標，我說就行了。但是國家不可以，大劇院是最明顯的，開頭三個方案沒給，最後一輪出出來了，開始就是方方正正，我給你帶了資料，你可以看演變過程，我最清楚，因為我那時候正在當院長，我起的頭兒。最後一輪，大概也聽到了一些意見，中央一點不保守，朱鎔基說了，在天安門這個地方，一個歷史的、傳統的。後來給我們傳達的時候，朱鎔基說了一句話，傳統的東西不要一線延長，尤其在天安門那個地方，東西長安街，你不能讓傳統的東西沿著東西長安街無限延長，那麼長安街都變成古董了，可以搞得前衛一點，就這麼一句話。傳統的東西咱們要保持地方的風格，尤其是要害地段，傳統的風格要維護，但是也不能無限延長，原來的大樓也不是的，說博物館裡的，現在也改了。那你大劇院是那樣的。

提問：對，我看幾個方案都是義大利的、清華的。

劉院長：對，到了第三輪、最後一輪，出了一個大蛋放進去。很多地方是很不認可的，從建築技術角度和工藝評論角度來說，很多人有意見。這個大蛋好不好這兩說，但是在天安門這邊不好，這邊部長都說怎麼辦啊，罵得一塌糊塗。14個院士上書，我們院的建築師，有名的114個人都簽名了，都反對。現在看也是失敗，從城市這個角度來說，從個性角度來說很好，非常個性。你去北海看，大極了，比人民大會堂大，它的尺寸概念比它大得多，因為它亮晶晶的，因為人民大會堂是不反光的，陰影也很多，國家大劇院就能凸現出來，它那個是鈦合金，反光反得厲害，

尤其是陽光好的時候。所以好多人說我說的是對的，風格上有點亂。

提問：而且從水下逃生。

劉院長：一個大劇院進出人群，進大門一百米、兩百米，也太誇張了。還有世紀壇，千禧年了，要有個建築，其實世紀壇不蓋、挪了最好，它是人流最多的地方，市中心本來就滿，但是跑到市中心搞了一個大劇院，大劇院一旦開張五千人，光停車位就得大概五、六千個，都擠到那兒，人民大會堂再一開會，大劇院再一演出，往哪開。

提問：在規劃的時候，五十年代的時候，那個地方就是給大劇院？

劉院長：定死了，大劇院就是這個情況，挖了地基，後來沒錢了。後來那個大坑就留在那兒，一直給它留著，它要不蓋就是人大，人大挪出來。後來也得勤儉了，給人民大會堂做了，原來早先是人大，大劇院不蓋了，後來一看，大劇院是世界級別的。京劇院進去了、話劇院進去了，歌舞劇院進去了，都進去了。但是話劇和京劇大概是一個，歌劇院是一個，表演廳是一個，然後還有兩個排練廳。你看京劇院長安街上有好幾個，長安大劇院最高級，還有梅蘭芳大劇院，後來幾個是文化部投資的，外國合資。

我現在看了看幾個，蘇州的文化中心，上海的文化中心都是他的，再看大劇院，從它蓋的樣子都知道。他沒法變，後來他給成都辦公行政區搞規劃，又是一類風格。

提問：就是成都市政府想要賣掉的那個？

劉院長：對，不敢要了。這個地方因為到了2000年以後，這八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力度大家都領會了，世界名師眼睛都盯著了，要出名就要在這裡，他們也不惜血本，要花很多錢的，安德魯那個太漂亮了，那個模型一看把我打動了，223米，這邊是一百多，木頭，全部是雕塑，腦袋上戴了一個倒扣的杯子，也是浮雕，銅做的模型。我們木頭做的，就覺得很高級。到了最後一下變成一個大蛋殼，評委好像是九個還是十一個，我忘了，很神奇，剛剛過了一票，九個就是有五有四，到底是九個還是十一個我忘了，外國評委再加上一兩個中國評委就行了。九個評委要五比四嘛，四個外國人說好好好，再加上一個中國人就行了。所以那些評委都拼命罵，評委也不一樣。後來多少個院士聯名，最後是中央拍板，上了項目，這個項目太大了。但是話說回來，你這個公開的，你中央招標，覺得不好就放一邊了，敢嗎這個事，形象也不允許。

提問：可是我們現在的奧運場館，它在風格跟形式上面怎麼去延續，這些風格是這麼重要的，它是不是要？

劉院長：外國的建築到中國做中國傳統的很難，比如說鳥巢像中國傳統。

提問：對，有一些說像碗啊。

劉院長：對，說像盆啊、像鳥巢啊，它的外殼一點用都沒有，撐頂上那個蓋，它的蓋是兩層，裡面一層外面一層，結構在裡面，叫我蓋我都不蓋，我不願意做。但是很震撼，喜歡不喜歡另說，為了喜歡花這麼多錢，就是一個形式。你進去參觀了嗎？

提問：進去參觀了。

劉院長：這點也是蠻厲害的，也有爭吵，後來也不用了，弄來弄去，結構不好，要切出來，這樣弄出來還行。進去看也是很震撼。游泳館進去過嗎？週邊是一個鋼架，然後鑲一個很高級的膜，裡頭挺完美的，裡頭看著像包的那種，也挺漂亮的，到晚上七彩燈光，這幾個建築做得確實是不錯的。所以你看著中國現代開放了，尤其是能夠接受中央電視臺，那簡直是一大奇跡。這是老百姓反應最強烈的，但是它建起來了，怎麼醜的建築，擺在那兒看個十眼大概也不醜了，看第

十眼覺得不錯、好啊，就是好啊。這東西也有一個教化過程、也有一個習慣接納的過程，開頭可能不接受，但是不是以老百姓喜歡來說的事。中國是叫大眾喜歡，這是一個原則。大眾喜聞樂見有一個過程，是現在喜聞樂見啊還是十年以後喜聞樂見，到十年以後絕對喜聞樂見，開始不懂，懂了以後再喜聞樂見。這是原則，不像什麼文學、美術什麼的，都牽扯到這樣的，是藝術就牽扯到這樣，喜聞樂見，現在我看反對的越來越少，贊成的、喜歡的越來越多，這個就是個性太強了。

提問：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迷失的，大眾喜聞樂見，要由大眾來設計，還是有一個專家，他們做出一個大眾的形式。

劉院長：這就是專家引導，他引導有兩種，一種是最近就喜聞樂見，還有一種開頭不是，開頭你不喜歡，過了一段時間越來越喜歡、越來越喜歡，這個也說不清楚，所以很忙、很有見解，我不是為大家喜歡做這件事，我是為了我的理念、我的信念做這件事，怎麼做的，就是那麼說的，做這個。做完了，罵聲一片、贊成一片，多驕傲啊。那天我想寫文章的，我一想算了，別惹事。

到二十一世紀，這一段中國建築是什麼，你來告訴我建築是什麼？

提問：我說不出來。

劉院長：建築就是一種形式。現在你看，全是這樣。鳥巢，這是最明顯的形式。鳥巢是一種形式，水立方是一種形式。它們起什麼作用，鋼樑起什麼作用，形式，絕對形式。現在房地產是位置、位置、位置，建築是形式、形式、形式。太誇張了，大陸建築師怎麼這麼激動啊。

提問：但是您這樣的得罪人。我覺得是氛圍。

劉院長：從日本回來一個博士，在這兒開了一個事務所，他要請我當顧問，我沒去。然後坐在車上，東三環過去，看了那個電視塔，覺得很震撼，我看北京建築，能夠具有世界潮流就這一個。這是中國的日本博士。建築他不知道這個斜的，電梯都是垂直的，房子是斜的，要有一個出現一點問題，就完了。後來又搞斜電梯，斜電梯弄不好更麻煩。後來就做垂直電梯。現在為什麼要懸賞六十多億去對接。連中央電視臺的台長臨時撥了一筆款，那層是觀光的，像中央電視塔一樣。他們的用鋼量也是很大。

提問：他沒有那個支撐，沒有那個鷹架協助它，在對接的過程中協助。

劉院長：像架橋一樣一根一根把它對接完，而且對接的東西，本身鋼的品質，那麼大一個大樓橫著懸在空中，很危險。

提問：而且我覺得那個角度，應該有超過它結構設計的這種需要的結構，它才能夠站穩。

劉院長：當然了，穩定度肯定很吃力的，要花很多很多的鋼。它也是很費勁。這幾個建築你可以看，這些都是我的建築師發牢騷，說中國是世界危險建築實驗場。有人喊的是群魔亂舞。但是話說回來，中國到現在，中央到老百姓，能夠接受，可見建築開放程度，相當開放。我這個建築風格接受不了，但是還不是很多，它的建築風格，我就喜歡。有笑話說打電話給中央電視臺，說你的樓蓋斜了，你怎麼還不知道啊，都斜成那個樣子了。什麼房子斜著蓋呢。

還有第二個觀點，什麼叫建築，建築是城市的靈魂，什麼功能不功能的，是一個手段，電視臺是一個，鳥巢也是一個。如果劃分這個，縮到二十分之一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成本，的確好看，那麼大太嚇人了。你看完了什麼感覺？

劉院長：要像中央電視臺，在國外，我估計國外不敢實驗，要不要花這麼大錢蓋這麼一個大樓，要出奇制勝世界第一，唯我獨有，我們也說了，我們不要把新建築造成一種實驗，新建築的

的實用簡直糟糕透了。我不知道你怎麼評價，反正是糟糕透了。它的功能全部是人造的，上面從裡面吊吊吊，都掉了蓋到一半不蓋了，沒錢了，要說不行，但是我覺得這個獨一無二，建築師以建築體形出奇制勝去做不行。他比較新，不像人家住的那個，絕對不喧賓奪主，那個大劇院太喧賓奪主了。

提問：但是北京整個城市對外開放快，像在南城找一個氣息，或者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帶動它的話，是不是用一個標誌性的建築去引導那個地方的城市的變化？

劉院長：實際上城市的發展是一個一隻手的杠杆。地方性的、標誌性的，你這麼繁榮，就是因為，往政治上了，賈慶林當市委書記，在城市裡頭做過兩大貢獻，第一就是搞中關村高科技地區，第二是搞了經濟，從城市規劃，把所有的資金和項目都往哪兒擺，你怎麼辦呢，你不去也得去，這就叫行政，通過城市規劃引導或者指導，實際上也可以說，城市規劃太厲害，要城鎮化加上行政單位就更厲害，最終南城沒有建，成本太高。這次又講梁思成，現在大家對梁思成評價很高、大家都講保護，舊城為什麼拆啊，門樓都沒了，為什麼不把不把這個搞到西城區。我就覺得建築實在是這些人太隨意了，就把自己的責任看得至高無上。剛建國，1949年進城，你得有那個經濟蓋新城，得有那個財力，第二年就打仗，朝鮮戰爭，沒有那個財力。變成行政區，有錢嗎？巴西利亞傾家蕩產搞了一個，那差遠了。共產黨為了打朝鮮戰爭傾家蕩產都不夠，所以只好在老窩上湊合著，老窩一湊合，沒錢了，老窩就這樣湊合了，就設成了一個區。

當然現在城牆能存在嗎，隨便亂刻的，就都沒有了。城牆留下非常非常難，再一個城牆留下了，城內的建築怎麼去保護，是不是原封不動，太平房還是那樣，那現在肯定是很破敗的，維護不起，不住人怎麼維護，住那麼幾個人怎麼維護。養不起了。你現在再去看北京城裡的四合院，除了高官、大財主住的能夠按原樣留著，剩下的都很破敗了，誰都不願意住。裡面的房子一間捱一間往外擴，建築師說話不腰疼了，為什麼現在有錢不改造啊，你給我們改造啊。費用太高了。八十年代我就說城牆應該拆了，但是你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現在人們又說建城牆。

原來我記得毛澤東進城，都沒有進老的大清朝遺留的園林裡去，為什麼共產黨沒有進到老的園林附近去住，沒辦法，因為沒錢。進去過，原來在香山那邊辦公，進城以後選位置、選位置，還在那裡了。到了1958年就不行了，1958年建國十年了，十大建築出來了，城市在變，做牌樓、小胡同，旁邊那個還是不能改，東牌樓、西牌樓，怎麼弄啊，就是提一個辦法，你看西安，那是保護最好的，裡面全是高樓大廈，比城牆高幾倍。如果我們城市發展了，把它圍起來，就安全了。但是現在城牆在這兒，裡面在這裡，跟花盆似的，跟城市面貌根本不是一致的。但是現在平遙又走另外一條路，大家去老城玩啊、吃啊都挺有意思。這是另外一條路，現在平遙裡面不讓建了，平遙多大點城啊，不讓建在裡面建在外面，大概幾十萬，不走，就在裡面。但是光維護這個城維護費用就很高，房子壞的、倒的，不管以後一片廢墟。到了2008年下決心花幾億大修一次，用了幾百年才大修一次。看咱們的建築壽命，五十年一大修，但是那個老城好幾百年了沒有修。因為修不起。

提問：我記得好像是19年。

劉院長：所以搞建築要客觀一點。搞學問就要看學問這塊。看梁思成這沒聲了，但是說現在幹得最缺德、最錯誤、罪大惡極。但是他們怎麼能這麼說話呢，如果舊城門不拆，復興門立交橋怎麼蓋，一邊一個大道出來，那還叫城嗎，一條道開一個門洞，城牆外面幾十個洞，一圈上百個洞，這還能是城牆嗎。要麼就是老城不發展，他自己用結構改變這個。

提問：但是奧運的機會，我覺得也是有一個討論，沒有一個場館是在南城，也許他造成的效果不一樣。

劉院長：這是你說的這件事，我問過大學者，為什麼最後選到北城，南城規劃這個地方不適合，我問過科學院院士，不是你的規劃、你的專案，搬不過來，搬過十幾個所來，很近，就是因為沒錢，後來就建成了體育中心，奧運會開也好、不開也好就給你留著。先開了亞運會，亞運會規劃小了，這地方給你留下了，怎麼往南城去搬呢，水電氣都有預留的餘地，怎麼往南城搬呢。

提問：在亞運會的基礎上，會在北城？

劉院長：對，很早的基礎上，我上大學的時候看過材料，有生物所、地球所都在這兒，那邊還有一個遙感所，就這幾個所。搬不動。

提問：當初這邊是很荒涼的？

劉院長：對，很荒涼的，到現在這兒還是一片綠地，後來就留下真正做綠地了。原來有這麼一個意見，我還參加過一個討論會說去南城，現在南城不通啊，南城往外走的路現在也不知道通了幾條了，原來就是永定門一條路，其他都不通的，走到菜市口就沒有了。北城好一點，開車很方便。南城是路不通，可能現在發展好一些了，這邊西北區、東區、北區和西區發展大城，再加上東邊有山，這邊有地下水、水位高，南城水位低。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打個管子下去就冒水。我們自己上大學的時候參加勞動，就把天然的湖砌上石頭，就往外冒水，就能當游泳池。現在不行了。那起碼有十幾年了。這邊好挖，十幾米，基礎工程在這邊比較好，南城像道路、水電氣這些基礎的發展的不太好。亞運會開完了都想蓋點場館，東邊弄點、五棵松弄點、各大學弄點，有一個帶動效應，就是機場，從機場開到那兒去。地下一修得修好幾條，後來就把南城的房地產先開起來，先把居民先安置，北邊地價抬得高，南邊地價相對低，現在南城現在也搞了一個亦莊經濟開發區，也挺漂亮的。那個估計要賣，隨著北城的發展自然而然要高。現在北城我估計差不多，現在往東城跑，CBD帶動的。CBD實際上是在選擇上欠慎重，不要叫那麼大，叫一個商業區會比較好。再一個問題，為什麼我老說西二環，西二環有一個金融區域。

提問：這個也有競爭是嗎？

劉院長：這個規劃不合理，東二環和東三環之間，搞了一個叫 CBD，CBD 叫商務區，最糟糕的是還有兩個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和中央電視臺都在西城，現在都挪到 CBD 了，尤其是北京電視臺最明顯，都搬過去，電視臺這樣很好的。中央電視臺也是，我知道因為中央電視臺的方案我們也都投標了，但是還是沒地，要五棵松體育場要是晚落成就到那兒了，發到光華路去了，那個地方出不來進不去。

提問：可是我原來在這邊好好的，為什麼要去那邊？

劉院長：他就是逼著你進去 CBD，因為 CBD 撐不起來，兩個電視臺進去就帶起來了，中央電視臺是最大的商業中心，雖然帶有文化性、帶有政治性，但是也是商業的。電視臺先搬進去，光華路就搬進去，根本地就不夠。所以蓋起來很費勁。地不夠，出來就完全走形了。我問台長，春節晚會大約有多少輛車，五千輛，都停哪兒，根本停不下。五千輛出不去進不來，沒法左轉，光在橋底下轉不行，就得右轉，出來以後也得右轉轉過去，是單向的。我們做過這個規劃，我們開頭沒有招標，我們北京院做這個方案做了好幾次。

提問：這其實是一個比較由上而下的方式，把這些機構搬過去，這些地方就搬遷了。

劉院長：北京電視臺就跑到南邊去了，現在在 SOHO 對面。我說電視塔再建一個，他說不建

了，那你們發射塔怎麼用？新台，14公里，不敢再建了，那個也是要花錢的。14公里安全能保證。如果遇到斷電，先切斷你電纜，你那個電網怎麼保護，他也沒有辦法。 提問：那他原址怎麼辦？

劉院長：也有啊。

提問：還是它原來的？

劉院長：北京台也是照樣幹，變成北京一台二台了，我說這樣讓你搬過去沒有什麼道理，他說是為了把CBD做大，把外商引進來，國內的企業先帶頭，中央電視臺進去、北京電視臺進去，那兒還有國貿。我最想不通的金融街在西邊，商務區在東邊，怎麼聯繫？一街都是商務區，沒有錢、沒有流動的。我覺得北京最大的問題還是規劃。規劃這個東西，要從這個層面上來講一直是一個問題，五十年代有一個最大的規劃是古城保護和新城建設，可能我們的國家原來不重視，現在重視。現在我覺得是過於重視，中國現在不知道怎麼辦了，現在是一個亂世當中，就跟原來的國子監，旁邊都砸了，現在都蓋起來了。你再大的能力你炒不過資金，這些都是需要錢，國家需要這個地方就蓋起來，你不給我就不來。但是中國也有問題，古城保護的效率也很高，你是博士你也瞭解，像北京、南京、西安這些古城，保護得量很大，要都保護保護不過來。就那麼建，建完了以後，不光咱們建，最後罵聲一片。

我去過希臘雅典，看人家也沒那麼嚴重，都差不多，現在人家四千多年，北京才一千多，有城才兩千多年，真正成都城才一千多年，但是就是這樣，炒得一塌糊塗。人家雅典也不炒，人家古味挺足，無論是在老城、新城，城市的發展越來越小，從形象來看，應該生在新城，家裡的老祖宗牌位放在那兒供著，應該是這個概念，而不是說新城和老城在一起，新城在老城的夾縫裡，不應該這樣。像雅典衛城，就把那一圈保護起來，只要別超過我，別占太大地方，什麼樣的房子、都在那兒，圍著一圈。

我們就不一樣了，我們先畫圈畫到清城牆，然後畫到明城牆，再畫到明城牆少了一點，現在畫到清城牆，大家在罵，說把城牆也拆了、城門也拆了，又畫到這一圈就慘了，這個城怎麼保護，那裡面肯定是破爛不堪，沒錢，但是現在又劃了，劃到故宮，劃到南海、東海、什剎海、後海、劃了一圈，這塊限制高度、限制形制。

提問：還是以中式建築為主？

劉院長：中式建築是原木結構，都畫，畫完了以後這片限制高度、限制形制。我說怎麼劃的，這麼籠統，城裡什麼都不能建，現在如果有錢，把行政區搬走，國務院搬走，這也可以啊，搬到新城區也行啊，但是能搬嗎，有這個能力嗎，沒有，所以現在新城和古城怎麼融合這是問題，光談保護也不行。現在談四合院保護更加重視了，我們搞了一個四合院改建，改了半截，又不行了，但建原住民怎麼辦呢，形式單建，裡面隨便搞，在外國不就這樣，唯獨外面的牆不動，裡面都是新的。我在外國看得更逗，是四方街區形的，歐洲是那樣蓋的，門窗都換了，在牆裡，裡面是一個高樓。

提問：臺灣也在搞啊。

劉院長：這就是啟發，他在那麼搞，現在要留記憶，就把這一圈掏空，裡面蓋大樓特別高。中國也有保護，但是保護是要花錢的。他撥款，現在有新區，也有古建築，古建築上非要蓋新大樓，那古建築不等著拆，他把古建築的牆什麼的全留下了，怎麼辦呢，四個大鋼架，然後跨過去，有這麼高，在頂上跨過去。他起那個架子為了保護這個，他做一塊玻璃，底下一層露著，進去一

看是原來的模樣，那個保護得也很好。

其他小房子我覺得也可以，但是不好看。

女：那這樣的話，本來就沒有了。

劉院長：底下牆都是玻璃的，底下都露出來了。底下用玻璃把它護起來，這個是要花錢的，那個房子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我還照了張照片。

提問：中國要保護的呢？

劉院長：中國要保護的太多了，就是經濟原因，很多都沒有保護好。我覺得北京的變化太大了。像四合院保護，這兒別拆、那兒別拆，也不去給建，都快垮了，也不清理也不重建，當然重建是要錢的，還有彩繪，彩繪再繪一次就過了，就變成現代畫了。頤和園也是，他整完了以後又收十塊錢，長廊也修了。還有圓明園保護的，要在遺址上重建。那天我去了一趟看了看，把水系都通了，栽樹栽荷花，其他的拿欄杆圍著，都不敢動，想要恢復。現在浙江有錢，要蓋新圓明園，在浙江橫店在蓋，原模原樣地蓋。叫新圓明園，不能叫圓明園，圓明園是專利，不能用。怎麼想都覺得沒道理，你說圓明園是世界名園，世界之最，當時是世界最好的園林，現在的遺址我們叫原生態，就這樣算了吧，新建就叫新建的，像亭子什麼的都複製了，都要仿製。叫新，原來的康熙、乾隆的園子建得這麼漂亮，你現在去能看得出來嗎？圓明園不讓建，中國也是，一說保護就不知道怎麼保護。你的遺址的東西少了。在臺灣有一塊，我去看過。

提問：臺灣城、熱蘭遮城

劉院長：也在保護，修舊如舊。我覺得這個也不錯，一百年、一千年歷史，一百年也舊啊、兩百年也舊啊，修舊如舊能舊到哪去，像故宮，修舊如舊舊到哪去，元大都去？明朝去？康熙去？乾隆去？現在修完了去看看。

提問：修的時候去過，但是修完的還沒看過。

劉院長：剛修完的，哪舊啊，滿城盡帶黃金甲，豪華的，根本沒有舊，舊了反而更麻煩。

劉院長：現在太和殿也修了。現在把神武門也修了，現在可能也修完了。再去看看，所謂的修舊如舊，哪舊了，特別新。現在給他規定，修舊如舊怎麼理解呢，這一圈，就是到明末清初那個時期就可以了。什麼小廟啊什麼的修到明末清初，這又麻煩了，到底是明末還是清初啊，明末和清初有什麼區別呢？明末修到康熙年間不就完了嗎，現在大家又在吵。

我們這段比較清晰，我是對建國以後，五十年代，是復古，傳統的民族和蘇聯的制式，由於中國古藝被批判，那是政治的原因，去批判。到了六十年代，就是1959年提出走自己的路，造十大建築，那就探討自己的風格。你看十大建築和蘇式的不一樣，和歐式的也不一樣，基本上是把中國的加進去了，民族文化宮也好都帶有歷史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痕跡。後來叫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有這樣一篇文章，建築界在上海開了個會，討論了好長時間，社會主義風格是什麼東西，給做了一個定義。我們有一個大的政策就是經濟適用美觀，後來條件被拿掉了，就是經濟適用美觀，但是又加了安全，就是安全、經濟、適用、美觀。但是作為建築它有它的特性，建築如果醜了，恐怕想要流芳一百年、幾千的就不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停了，無所謂了。

然後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可以分三個階段，八十年代一個階段，基本上是開闊眼界，西方的什麼都新奇，高樓大廈發展的快，以香港風格為代表。建築師們也想在這個時候追求個人的建築地位，改革開放以後也逐漸提高了，要發揚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個性、自己的見識，這個就是深圳最典型。然後到了九十年代，中外合作廣泛，歐美的、日本的、澳大利亞的就都來了，使

得我們更進入到世界現代建築潮流。到了 2000 年以後，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後十年，更加開闊地走向實踐，再好的東西我們不認，但是有爭議的我們也要，在爭議當中謀發展。在這裡有一些建築師不服氣，在世界建築師的競爭也好、共存共榮也好，在這裡追求自己的風格。我覺得從 2000 年以後的這八年，很多自己的東西初步成型了。所以有一些建築可以看到做得不錯，一點不比外面差，像美術館、體育館，體育館都是世界級的。都做得很好。包括鳥巢、包括大劇院，不管體現得怎麼樣，體現出來了，鳥巢和水立方、一文一武、一張一馳，說得都挺有含義的。也挖掘了裡面中國的東西，外國人也不可能不加，他們也得適當加一些。要尊重中國文化、發揚中國文化、保持中國傳統。像安德魯他們都這麼說，這不是西方的，不是美國、不是歐洲的，就是中國的。

但是我覺得在中國，容納性、包容性更強，能接受世界新的風格。尤其這幾個建築，可能是當代最潮流的，中國都能接受，現在不接受不要緊，過幾年都能接受，現在可能有點情緒，過兩年就好了。當然這幾年中國的建築師更自覺的，有點奮發圖強追趕世界潮流，創造自己民族的東西。我給你看看。

你看這個，你看這個，首都新建築，但是是群眾喜愛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是老百姓喜愛的，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文化宮，大會堂，帶簷的，西方三段式都有，很清晰。人民大會堂，群眾最喜愛的，這是在報紙上投票評出來的，這小子耍了個滑頭，我說什麼叫民族風，他說不要緊，我給您辦個投票，您看看就明白了，結果他真給辦了，北京日報上登的，這是 1959 年的。當時投票人民最喜愛的。人民大會堂是典型的中西結合，西方三段式一清二楚，但是中國的柱子也有、兩個簷頭也有、基坐也有。

然後到了奧林匹克，就開始走向世界了，這是九十年代的事。

提問：這個也能入選？

劉院長：也能，他覺得像這種就像大廡頂，基本上這個坡度就是大廡頂的坡度。

這是故宮的台坐，有三基台，這是無梁門的基台，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個可以看看。這個只能看看，第二都造不出來，四合院怎麼能納三層樓呢，空間比例都不對了，太嘈雜了。他去做那個實驗還得了一個國際獎，但是我覺得不太適應，做學問可以，但是模式不行。你想三層樓怎麼圍四合院，吵死了。

這是美術館，它就是簷子、柱廊，很中國化，這個你可以看看，現在還有一個畫展。有的人把香港的學來，又想搞一點自己的東西，又不是很明顯。這個你看潮流，一點點看，中國的竹簾一點都不次，竹簾這塊從高檔到低檔，而且有各種風格的，歐陸風也有，義大利、美式的、加式的、西班牙式的、泰式、馬來西亞式的，多極了。賣得非常好，在深圳出關，保安、第一站。有錢蓋行政中心，現在行政中心都是大廡頂，跟過去衙門似的，都是大廡頂。這是我們現代的風格。

這個是全國的動態，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書現在在哪找我就知道了，這是國外開會帶回來的，中國的東西帶回來的，這是到 2005 年中國建築作品選，世界建築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各地的一些建築，你看辦公樓，現在很簡潔了。這個你看，要吃准了，這個作為酒店有點生硬，全是伊斯蘭的風情，這個事務所水準還蠻高的。叫大悲透濟（音），挺能耐的。這是伊斯蘭文化，這一大片，好大的，0.85 個平方釐米，這個我覺得有空讓她帶你去渡假、泡溫泉，這個在珠海，幹了一年半。但是裡頭就糙了，裡頭是裝修公司做的，基本上往伊斯蘭靠，但是靠得不夠，伊斯蘭的浮雕，非常漂亮、非常細緻，你這個搞點簡單的。現在容納百川，只要有錢就行。這個是夜景，每天爆滿，不到半年三個億進來了。

簡單地說一下，因為我沒有資料。

還有什麼問題嗎？就是聊起來了，說說而已。

提問：我覺得學到很多。

劉院長：臺灣現在設計上感覺不太大。

提問：對，而且做不了。

劉院長：那邊大概也不是中國很喜歡，現在中國的眼光高，世界的、歐美的，現在是美國和歐洲的。九十年代歐洲和美國都往裡進。因為它成本太高，我們的方案費十萬美金就了不得。

提問：但是現在給的設計費也高，都是百分之十幾。

劉院長：這個你不知道，這個我們說了不算，方案費很低，都虧本做，給個三二十萬，都不夠的，二十萬美金算什麼，在我們那兒整個設計也差不到二十萬美金，但是就幹。一旦拿到了，像安德魯設計那個大劇院，最後不知道給了我們，他要了一個億的設計費。中國才拿多少，兩千五百萬。

提問：那不成比例啊。

劉院長：那個院長說，你別拿了，留給我吧，咱倆別吵了。我說就算了。後來給我四百萬審評費，我就是一個審評，他就拿了兩千多萬。原來給他八千多萬人民幣。

提問：不成比例。

劉院長：人家當然住五星酒店，來回坐一等倉。我們出去都是經濟倉，三星級、四星級都不錯了，跟他不成比例。所以他給中國幹，看著拿一塊設計費來，我們都沒有。他就是方案和施工指導，就拿到了九千萬，就不得了。他原來要一億三、一億一。

提問：那鳥巢呢？

劉院長：比例也都這樣。他都明白。中國是按中國的費用，包括開發商和業主也不會給你那個錢，外國錢是按外國標準給，中國是按中國的標準給，你跟我合作拿外國的標準不可以，八以上，我們拿 2%、或者 3%，個別的 3.5%，拿不了太高，他拿到 8%、或者 9%。就是一百萬他的設計費是八萬或者九萬，我們的設計費在兩萬到三萬之間。差好幾倍，所以他給你的錢也不會多，都是業主在給。他給我們就占點便宜，但是業主不幹，施工圖這塊我贊助圖紙了，他也留點。

所以香港我們合作了以後，上大事務所，來到中國的公司，包括到臺灣，我派人過去，當場跟人談工資，還有差旅費、長期駐外費，那個補貼起來才差不多一倍到兩倍。假如比我高五倍，加一塊就十倍，一個月月薪十萬，我一個月一萬，那怎麼平衡啊，你水準比我高十倍我也沒意見，不可能啊。就因為這個鬧矛盾。我們就各拿各的。海歸拿的也比大陸本土的多一點，一個他自己要價，如果他自己獨立了那無所謂了，愛要多少要多少。因為設計費就是這樣。

提問：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國外的設計事務所，是聘了很多海歸的，他等於還是我們自己人，可以這麼說嗎？

劉院長：對，他給他錢，一般的外國公司聘的人，錢是要高一點的。比國內當地的高一點。海歸回來的錢我們也給得高一些。所以你現在在大陸辦公司、在外國辦公司，基本上會派一兩個管理人員，他寧可多給他點錢，其他的都是當地的。海歸是派過來的，我們那邊好多人，加拿大一個 B&A 這個公司，也是加拿大一個大的設計公司，看到幾個人常駐上海，還有辦事處，有好幾十，看我們三四個人出去，都是我們院的，都是派回來的，但是人家工資拿得多一點，人家起碼掙五六萬的。有好幾個。原來一到春節都到北京來請我們吃飯。現在也不請了，名氣太大了。還

有另外一個公司，一看都派回來了，中國通，設計技術他懂，設計價錢他也懂。

提問：模組根本就不用講，都是自己人？

劉院長：現在設計說白了是很通用的，有什麼區別，除了一些具體的標注不一樣、標準不一樣、規範不一樣，其他都一樣，有什麼區別，沒什麼區別，而且現在在外國來的設計師，第一除非他有特別表現，肯定是中國通，所有的彩繪都中國畫，所有的手繪都中國繪。我有一個同學跑到迪拜，那天他回來找我的同學，給他畫圖。他就是一個概念，說你給我畫出來，畫完了以後畫彩圖，畫完以後全是中國字，木的也好、塑膠的也好全拆下來他用了，便宜。我們做才幾萬塊錢，再大的十萬八萬就夠了。到外國沒有五萬美金下不來。我們畫一張草圖，現在電腦畫才幾千塊錢。我一個同學在美國也是，設計也沒有資格，給的錢也不多，畫手畫圖，現在美國電腦都不值錢，一張圖我們叫三號圖，五千美金，他一個月畫四張或者五張。當然他畫得也好，他是我們班畫得最漂亮的。

大陸的建築師手頭功夫很厲害，尤其是表現風格很厲害，畫得非常漂亮、完美。美術課從素描畫到水彩，畫四年。所以一般手頭功夫非常好，所以畫表現他不怕，但是電腦一來了就傻了，但是現在又傻了，電腦不值錢了，手繪、藝術品。所以他經常畫，看他畫的，鏡框那麼大的四千到五千美金。反正現在電腦已經過去了。

提問：設計已經變成一個產業了。

劉院長：我可以告訴你，室內設計過去跟建築設計是不分家的，在改革開放八十年代，有了室內設計建築，我們是國內第一個做室內設計的，開了一家。到了九十年代，環境設計，就是園林這塊和建築環境這塊引進。環境設計也是建築的一部分，原來是很簡單的，現在叫空間環境，包括室內環境都有專業的。還有城市設計，城市規劃原來就是傳統，現在有一個交界點，跟社區，多大算建築，多大算城規的，不清楚，兩家都做。比如三十萬平方米、五十萬平方米、社區，幹什麼啊，這是算規劃還是算建築。但是到城市規劃這塊，規劃也分，現在資質有了，環境設計有環境設計資質，建設設計有建築設計資質，室內裝修有室內裝修資質，分成四塊，當然還有其他的，單獨的，那是另外一塊，跟我們配套的，水、電、氣結構，在建築設計院。

所以現在我們的基本體制，基本的建築體制是綜合的，也不是單獨的，表現小的也是綜合的。現在出現了專業的事務所，有專門搞結構、專門搞建築的，大部分都是國外回來的，我女婿就在專業事務所做建築，是一個海歸，打著美國的品牌，做方案，這樣的專業事務所，再找一個下家合作。所以專業這塊，在體制來講還是這樣的。

東西這塊沒有單獨立，但是職業這塊多了，包括拿一個職業建築師，因為要去幹活，給你一個註冊建築師，註冊有一級二級，一級能幹什麼、二級能幹什麼，現在你有那個章就有權了，沒有章就沒權了。現在資質委員會有一個註冊制度。臺灣我不知道情況，香港差不多。你那邊是註冊建築學會管？

提問：考試院。

劉院長：還是建築學會管。

提問：跟美國比較像。

劉院長：我們有一個資質委員會。是政府領導的民間組織，就像建築協會一樣。政府不養你了，給你點事業費，完了你這塊有獨立活動的權力，有一些權力，包括審核、晉級。過去評獎，一等獎、二等獎都是行政，現在已經逐步開始民間化，民間團體、學會來辦的，現在資質也開始，

建築師註冊有建築師協會，是民間的，不是政府的，還有考試，還有考試，每年都要學幾本課，每年啃幾本書，三天，學完了考試，考試完全合格了再登記一下，你若漏了多少次就取消你的註冊資格，註冊很厲害，有權。

提問：那現在怎麼規範呢？

劉院長：規範剛開始的，現在我不去考也有代考的，因為管得沒那麼嚴，將來可能會嚴，像香港非常嚴格。我們一批一批不太大，所以現在註冊建築師也是每年都有不註冊的，必須都把學分學夠，學完了都考必修課，現在像他們那種學生畢業很難了，像一畢業四年五年就是助工，助工完了以後就是工程師了，工程師就開始每年考，考的都是基礎課，很厲害，像我們都是專業課，環保、節能給你一本書，這個都是補充你的學業，但是這個是基礎課複考，數學之類的都進去，他們考很難。現在設計師、律師什麼的都考，很難。現在要正規，所以現在像這種制度有好處，競爭強了。像我們過去一畢業就是國家分配，你去這個設計院，你去那個地方，去完了以後就幹，見習一年，第二年轉正，轉正成技術員，技術員再做三五年是副工程師，再過幾年成工程師，再過幾年副高級工程師。然後你去了就分配，工資都有級別，開始 46，然後 56，然後 72、82，都是國家定的，你按你的工資吃飯。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是 1983 年開始自負盈虧，但是國家還管你，到了 1986 年、1987 年就不管了。你賺多就多賺。跟各個設計院之間待遇不一樣，設計院內部人員之間的待遇也不一樣。基本工資沒改，但是附加的部分遠遠超過基本工資。

提問：那每個工程師是獨立的？

劉院長：獨立的，過去叫承包，就是聯產。你做多少活、拿多少錢這是死的，然後你們分去，但是你跟他分的就是一樣，你做了十張圖，做方案做得快，這個月他可能拿一萬，你可能就兩千。

提問：那這個院本身還有一些基本的管理費吧？

劉院長：對，有一些設計費拿來以後，去掉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跟你沒關係，剩下的你們分去，分給你多少、分給你多少，按比例切就完了，這些錢給養老、住房、費用整理、大樓暖氣供電都是我包，你就在這兒幹活就行。

提問：剩下的 60% 等於你們工作室可以自己說了算？

劉院長：對，自己說了算，他不管你。花了多少、花光了、沒有錢了不管你。你出差、住飯店差旅費一大堆也不問你。

提問：那就要看這個工作室的領導……

劉院長：我帶領的時候就把這一塊下放到所，一個所一百人，以所為單位去做，這個專案拿下來總數一千萬，我把四百萬拿走，剩下的就給，你這裡邊有工資、有獎金、有車馬費，有各種耗材，都得包括了。我那 40% 是管房子、管退休、管醫療保險，管大樓。如果說住房可以小點，就把房費給你。車馬費就是管這些，院長、總工程師什麼的。

提問：那為什麼最後都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劉院長：新院長來了，現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提問：好多好多人找到，說我也要過來當家了。

劉院長：對，你招商招不來就是空的，比如說你有號召力，能一下號召二十個，二十個跟你就跟你。我一就五個人，有的人就不要了，工資低點、收入少點也幹，如果把人都甩出去，沒人幹活了。現在是工作室，工作室怎麼做呢，全院有一個任務小組，有七八個人專門去拉活，拉來

以後就分到下面的工作室，你這個是建築工作室，這個是結構水電，比如一百萬，我切出四十萬，剩下的建築室拿三十萬，那個拿十萬、那個拿二十萬，剩下的就發獎金、發工資，不剩下就沒有。管理部門就拿專案，也出點，七出八出。有的一年十萬二十萬，有的一年就幾萬。有的沒活、有的信譽不高，不買我賬，活也拉不來，給了我業主也不幹，他要價也高，2.5%的費用，我肯定是3%的。將來這種就是水準越高，你要價越高，誰做方案你給人幾萬塊錢，人家當然不幹了。所以像這種名人工作室選擇性很強，願意幹就幹，不願意幹，有名氣的確實做得好，大的項目太多了，絕對他們項目做得多。中國的建築師，在改革開放之後的這三十年，發展得非常快，現在我們的大學生來了就幹活，三五年基本就獨立了，七八年就到設計組工作了，很快啊，剛當七八年設計組長就不安心了，就要跑了，為什麼呢，我給了十五萬，人家一下給三十萬，就請走了，請走就算名人，不一樣。現在大學生到我們院來發展得非常快，上手就幹活，而且都是大活，不是沒活幹，就怕把他累死。

—完—